

# 十九世紀科學學科專業化 與俄羅斯古代城市的歷史論述建構

陳柏毅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奧斯汀，美國

## 摘要：

本文討論十九世紀前半俄羅斯的城市歷史論述是如何被歐洲思潮影響。透過 Paul Farber 的學科專業化與 Joep Leerssen 的文學歷史主義先後影響，一股將知識科學化分類、然後影響了古典文獻的收集與重新被詮釋的風潮興起，民族文學這一觀念也在這個時間點開始出現。然而，當代文獻在討論俄羅斯古代城市的歷史論述建構時，都沒有將其與西方思潮聯結。因此，筆者透過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與基輔這三座城市在十九世紀是如何被重新詮釋為切入點，探討俄羅斯知識份子是如何受西歐思潮影響、又建構出了什麼樣的歷史論述。

## 關鍵詞：

學科專業化、文學的歷史主義、中世紀精神、俄羅斯古代城市

# **THE SCIENTIFIC SPECI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ANCIENT RUSSIAN CITIES IN THE 19TH CENTURY**

Po-yi Che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U.S.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ancient cities in Russ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though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e specialization by Paul Farber and the literary historicism by Joep Leerssen, a trend from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ing knowledge to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nuscripts and reassessing their values was on the ris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was formed simultaneously. However,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the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ancient cities in Russia to this Western trend remains scant. Therefore, I will discuss how Russian intellectuals reassessed and reinterpreted Novgorod, Pskov, and Kyiv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considering wha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 built behind them.

**Keywords:**

Specialization, Literary Historicism, Medievalism, Russian Ancient Cities

## 1. 導言

筆者旨在透過與城市的歷史論述建構結合來探討俄羅斯十九世紀的思想史發展，是一篇試探性的討論。十九世紀前半的歐洲正經歷重新形塑「知識」意涵的轉折期，且因為這個轉折期雜揉了過往以歐陸文化為主軸的歷史文獻與時下殖民時期匯流的八方資料，使得在現代的學術研究中都會以各種方式提到、卻又鮮少有專門的篇章來論述。因此，筆者在這篇文章當中試圖透過討論這個轉折期極具代表性的「學科專業分科化」的過程來看這波歐洲湧起的思潮是如何沿著陸路傳播一路東向，並又為俄羅斯的廣袤土地帶來了何種影響。

本文的研究途徑著重在可塑性 (malleability) 的討論，並以不同學科的角度切入。可塑性並不是一個研究方法，而是筆者透過不同學科領域的討論來刻劃出一種樣貌。筆者將以科學史家 Paul Farber 提出的學科專業化 (the specialization) 為經，並加入文學史專家 Joep Leerssen 筆下的文學歷史主義 (the literary historicism) 為緯，相互編織出西方思潮的基本樣貌；之後，更透過斯拉夫學者 Serhiy Bilenky 近來研究的基輔城市想像以及俄羅斯歷史論述中的城市進一步思考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民族建構是如何在這個時期奠定基礎的。應當提出地是，筆者在標題使用了「科學」學科專業化、而沒有沿用 Farber 提出的學科專業化的原因在於一方面強調是科學的學科被建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今對於學科專業化的討論眾多，想要突顯出差異。

## 2. 科學學科專業化與中世紀精神的交集

學科專業化的概念一直都存在於近代史的研究範疇當中，縱使多是以「職業化」或是「專業」相關的詞語出現，也多涉及一個專業的學科以及相對應的職業已經出現的二十世紀。十九世紀中期的俄羅斯帝國既未出現這種職業化的概念、專門的學科也還在發展當中，而透過 Farber 的鳥類學研究可以窺見這個在十九世紀仍未定型的概念是如何被理解的。Farber 提到在十九世紀前半的歐洲當中，對於「知識」的分類促進了「學科」的發展，在這段期間，歐陸在順著殖民主義的擴張在世界各處大肆搜刮奇珍異寶及動植物樣本之後，不只是需要將它們存放在同一個地方來保存，

也需要將其分門別類、系統性地豐富國家的收藏；同時，這些短期內大量積累的原始資料也吸引了大眾的目光、並進而出現一批想要多加研究、協助分類的人 (Farber, 1982: 147–148)。專科的研究學會也在這段期間創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1822 年在德國創立且是歷史最悠久的自然科學家與醫學家學會 (The Society of German Natural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在學會當中，對於特定科學議題感興趣的研究者可以交換意見 (保羅·勞倫斯·法伯，2015，頁 117–118)。無疑地，這種學科與學會的互動模式一直演變直到今日。

若以鳥類學的發展來理解科學學科專業化，則會是在十八世紀後半，博物學與博物學者佔據主流、研究著有關於世界的動物與植物；然而，在世紀之交時，有越來越多的原始資料出現，也就讓博物學者的興趣逐漸分開，鳥類學便是在這個時候脫離博物學的範疇、透過鳥類學會的設立以及相關研討會的舉行來發展出自己的學門。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十九世紀中期出現的「職業」觀念，Farber 提及在 1850 年代時，囿於學科專業化大量累積資料的影響，已有研究特定方向的學者表示無法同時處理太多子科目的研究 (Farber, 1982: 149)。應當注意地是，這個概念已經與十九世紀前期知識份子的職業觀有所差別，而這個變化可以透過 Leerssen 的研究來側面窺得。

Leerssen 透過學者重新重視中世紀精神 (medievalism) 的角度切入，探討在談到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這段時間西歐社會文化的顯著變化。除了提出當時的知識份子同時擁有兩種社會頭銜、只是當今的學者多將焦點放在其中一種之外，Leerssen 也由文學的歷史主義 (literary historicism) 重探當時的文學史，點出當代學者對於文學經典的認識已經經過再次解讀，反應出十九世紀前半的思想轉變。透過兩種社會頭銜的角度切入可以窺得科學學科專業化的一隅，以 Leerssen 的其中一個例子來說，他提到 Prosper Mérimée 除了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之外，也同時在 1834 年被政府任命為歷史文物總督官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France's historical monuments*) (Leerssen, 2004: 223)；這種雙重頭銜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代表著當時的知識份子習慣於處理不同領域的事務，而且

也不太有難以負荷情況。若以時序來看，Leerssen 處理的是截至 1840 年的西歐社會情況，若對照 Farber 對於 1850 年代知識份子的敘述則可以發現雙方研究並沒有互斥的情形發生。

然而，不同於 Farber 持續鑽研著鳥類學在十九世紀後半的發展，Leerssen 持續探索十九世紀前半，只是透過中世紀精神的概念往回觸及文學思想史。

中世紀精神是一個相對彈性的學術名詞，主要是在描述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如何被這段時期的遺緒影響，想當然爾，這種影響是全面的，也因此難以定義這個詞的完整意涵。Leerssen 在談這個現象時，除了適度地涉及其對於文藝復興或是浪漫主義等的關係之外，主要還是在談延續至十九世紀前半的古典文獻重探，這些文獻雖然被存放在生活中的某個角落，但是已經隨著時間而脫離了大眾的目光。正是在科學學科專業化興盛的時候，這些文獻也同時再度映入眼簾。隨著散落在歐洲各地的古老文獻重新被蒐集起來之時，許多私人的古典文獻藏品也逐漸被整合並提供給公眾使用 (Leerssen, 2004: 227)。正是在這種社會與學術的氛圍底下，歷史主義的概念被提出並且在十九世紀前半被學者廣泛討論，一言以蔽之，歷史主義談的無非是信史的應用，透過科學的方法、有信度的史料來建構歷史；筆者認為，這種想法很容易被與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 聯結，用來討論為何某種思想在法國是一個樣子，等傳到了俄國之後又變成另外一種樣貌。

奠基在歷史主義的討論上，Leerssen 提出了文學的歷史主義並連結到民族意識在十九世紀前半的建立之上，其中民族史詩 (national epic) 的出現極具代表性，他更以《卡列瓦拉》(Kalevala) 為例，指出這部芬蘭的民族詩歌在十九世紀之前並沒有和芬蘭的歷史聯結，而是在十九世紀前半透過歷史主義的概念為底，並輔以當時的民族思潮而成形 (Leerssen, 2004: 236-237)。筆者以為，這條思路同時將卡列瓦拉作為一個由來已久的文化群體與帝國侵略的對象兩個議題融合到文學範疇當中，展現了當時知識的概念和當今的現代知識是有所差別的。

筆者認為這種民族與文學的交織討論與矛盾在斯拉夫文學史中也是一個常見的主題。例如 Snyder 就以遠近馳名的「波蘭」浪漫文學作家為例，指出其出生地及主要作品《塔杜施先生》其實都與白俄羅斯有直接關聯，而該作品的意涵則繼承了波蘭與立陶宛聯合大公國的思想，作者本人並沒有預設波蘭與立陶宛在之後的歷史發展中會分道揚鑣（斯奈德，2020：38–39）。因此，把作家區分為波蘭的、而不是立陶宛或是白俄羅斯的，其實是顯示了現代政治的影響、無法真實呈現當時的原本樣貌，也就違背了歷史主義的精神。

Leerssen 的討論雖然沒有正面涉及科學學科專業化，但也是透過文學思想史的角度來旁觀其影響，指出透過歐洲內部的古典文獻的大量積累與分類，配合著歷史主義的運用來連接民族文學的興起。筆者認為，Leerssen 跟 Farber 的研究為科學學科專業化的影響力討論架構了一個很好的空間。

### 3. 切入俄羅斯的轉折期：科學學科專業化在俄羅斯

若要將前述的科學學科專業化脈絡放在俄羅斯研究中，最普遍的方法大概是討論斯拉夫派與西化派的論爭或者是由社會史剖析學術機構的發展；然而，筆者試圖透過城市歷史論述的角度來切入，希望可以擦出不同的火花。在討論城市的歷史建構以前，筆者想要先討論十九世紀前半的俄羅斯是否接受到同西歐一樣的思潮？俄羅斯帝國的知識份子是否也正經歷著知識概念轉變時的掙扎？

針對第一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在俄羅斯，十九世紀中期的學術圈也迎來不同的轉折。科學史學者 Pavlova 指出在 1840 年代，俄羅斯科學院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進行了一系列的革新，除了重整院內的組織架構，也設立了三個不同的部門，其中包括了物理數學部門、俄羅斯語言與文學以及歷史科學與語文學 (Павлова，1990：99–100)。無獨有偶地，莫斯科大學在 1850 年也有類似的系所改革，分別增設了歷史與文學系以及物理數學系。這些體制上的改變雖然不像鳥類學那樣明確，然而，卻也代表了俄羅斯帝國正在以某種方式改變中。

除了俄羅斯科學院以及莫斯科大學的機構改革之外，也可以透過 Petronis 關於俄羅斯帝國民族誌地圖的研究來了解。Petronis 表示，1845 年俄羅斯帝國地理學會的成立為後來帝國的地理學發展帶來極為正面的影響，這股在西方成形的地理學學科將能讓俄羅斯更有系統地了解自己的帝國；然而，在成立的時候，不只是相關的專業人才缺乏，被分派至該單位的長官也不具備有科學化的地理學知識 (Petronis, 2011: 62–63)。據此，筆者以為系統性的訓練在當時也都還在建立中，將俄羅斯帝國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模樣流露出來。

而回答第二個問題則需要考慮 Farber 與 Leerssen 的論述。Leerssen 提到的文學的歷史主義與民族意識的抬頭當然也都影響著俄羅斯的思想史，具體體現在國內的東、西思想辯論；然而，俄羅斯知識份子當中是否有類似於 Prosper Mérimée 的例證？又是否有像 Farber 提及的 1850 年代的知識份子那樣無法專注在過多的學科次專科領域？

第二個問題衍伸出來的子題的答案也都是肯定的。縱使筆者不清楚俄羅斯知識份子當中類似於 Prosper Mérimée 的存在比例有多少，要找到例證倒也不困難，就以提出官方民族主義 (Official Nationality) 的教育大臣 Sergey Uvarov 來看，他在政府任行政官職時，同時也是一位鑽研古代希臘與羅馬文化的知識份子。或許是囿於現代思想史學者的研究興趣，烏瓦洛夫的雙重身份一直以來都鮮少出現在學術篇章的討論之中。

至於 Farber 提到的知識份子無法掌握太多科目這件事情也可以從文學領域找到蛛絲馬跡。筆者透過 Alexander Herzen 與 Ivan Turgenev 的作品來窺得輪廓。透過回憶錄《往事與沉思》第四卷的描述，我們可以看見 Alexander Herzen 與 Mikhail Bakunin 之間對於單一職業的討論。在十九世紀前半，在俄羅斯讀大學的知識份子通常都身兼兩職，一方面是專精學校傳授的知識，另一方面則是進入政府的軍官體系。米羅諾夫的研究顯示，俄羅斯的軍人入伍統計由 1801 年的 37 萬九千人上升至 1857 年的 111 萬八千人 (米羅諾夫, 2006: 217)；若以軍隊編制的角度來看，越多的軍人

則需要越多的軍官，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通常也都在這個軍階體系裡面追尋職涯。然而，Herzen 的回憶錄則提到了 Bakunin 的退伍考量，指出 Bakunin 在 1836 年退伍之前曾經與他討論過這件事情：持續在軍隊擔任軍官是符合他家人的期望，卻不是他本人所預期的，他要的是持續專注在鑽研且實踐學術。這件事情或許只是單一巧合，但多少也展現出了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也同樣表現出西歐的知識份子在科學學科專業化的思潮之中會有的徬徨。

相較之下，Turgenev 的小說則更切中 Farber 的論述，筆者認為透過《羅亭》與《父與子》男主角的描述可以看見端倪。這兩本小說當初都是以連載的方式刊登在雜誌上，《羅亭》的男主角羅亭在 1840 年代初期抵達某地方的莊園，並滔滔不絕地展現雄心壯志，最後在莊園女主人的女兒私下傾心許諾之後，匆匆逃離現場，並輾轉先後在其它莊園與學校進行自己心中的實際改革，可惜都未能有成果；最後，他於 1848 年在巴黎的兵工廠起義 (the revolution of the ateliers nationaux) 中犧牲。Turgenev 並沒有詳述羅亭的學歷背景；然而，透過他的辯論與作為，可以發現他並沒有專精於特定學門。相反地，《父與子》中的巴札洛夫則在 1850 年代中期自醫學院畢業，之後回家跟隨其軍醫退休的父親一同服務地方，最後並因解剖傷寒 (тиф) 遺體不慎切傷手指而被感染致死。由此可以窺得 Turgenev 是如何在兩本背景相差十來年的連載小說當中，潛意識地將科學學科專業化帶來的影響寫進文本，也同時作為 Farber 提出概念的一方佐證。

#### 4. 切入俄羅斯的轉折期：科學學科專業化、文本的歷史主義與城市歷史論述建構的交織

在討論城市建構的議題時，筆者認為應該同時強調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以降的「俄羅斯城市」已是不同的概念，其中包含的範圍就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縱使有些當今劃出俄羅斯領土之外的城市在十九世紀都還是或正在歸為俄羅斯帝國轄下，本文也並沒有意圖要把它們過度與俄羅斯文化連接。

城市的歷史論述建構在十九世紀前半的俄羅斯無疑是往將其納入俄羅斯帝國的歷史論述底下的方向過去，而俄羅斯帝國先是

在十九世紀前半壓制了境內的波蘭民族復興浪潮之後，在 1863 年之後更將矛頭對向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復興（斯奈德，2020：162）。此前帝國認為烏克蘭會對政府保持忠心，卻沒有料到烏克蘭，特別是基輔這座城市，在十九世紀前半會協助俄羅斯抵抗波蘭勢力只是出於後者長期的統治不得民心。筆者認為這種俄羅斯民族一統的意識形態也並不完全是因為民族意識的出現才造成的，民族意識多與十九世紀才出現的民族史詩等重新詮釋古典文獻的知識形態一起出現，而這種重新詮釋的手法也多受到科學化的知識分類習慣有關係。然而，在科學學科專業化產生影響力以前，許多文獻也都記載了城市之間的權力更迭變化，在中世紀時，一座城市也會因為勢力衰微而改隸於另一座城市，並且在文字紀錄上展現了臣屬關係，這樣子的情況因為不涉及前述討論的民族意識脈絡，也就需要從政治或社會經濟關係去解讀比較恰當。

筆者於此要討論三座九到十世紀基輔羅斯時期就已經有歷史紀錄的城市，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以及基輔，三座在古羅斯時期都與西斯拉夫文化有過交集的城市，並透過學術研究的軌跡去探索其歷史論述的建構過程，並試圖將重心放在這些論述與科學學科專業化的交集。值得一提地是，現代學者對於這些城市的討論許多都建立在重建當初的文化一隅，較少著墨於城市的歷史論述建構。針對諾夫哥羅德，近期的研究包括 Zinoviev 談論其中世紀的犬隻研究，Antipov 與 Gervais 則觸及了中世紀的教堂用磚與建築樣式；對於普斯科夫，則有 Slamina 的漁獵遺跡探究；對於基輔的研究則在這兩年多了許多，強調其獨立性格。

若將焦點放在十九世紀的古代城市歷史論述建構上，則會發現其與前述的科學學科專業化與（文學的）歷史主義有所關聯。Halperin 在研究諾夫哥羅德的歷史時，表示現有的研究經常沿用十九世紀知識份子提出的東、西方論辯中，將諾夫哥羅德與其背後的「民主體系」，意即為制會（вече），同莫斯科公國的「東方專制體系」做比較，將承襲自浪漫主義的美化思想發揚（Halperin，1999：345）；然而，這種理論與繼之引發的學界反思都將焦點放在諾夫哥羅德的意識形態討論上，忽略了諾夫哥羅德史料中一再提及的土地（Novgorodian Land）觀念（Halperin，1999：348）。土地與意

識形態的關聯在於後者的成立仰賴於前者的明確定義，這樣才能夠確認諾夫哥羅德是否有在某個地域範圍內產生長久的影響；那麼，諾夫哥羅德的歷史文獻中是如何呈現這個關聯？在透過編年紀事等史料的一番追尋之後，Halperin 認為這個名詞的定義沒有很清楚且在某些情況下會和 the Novgorodian volosti 意思相同，代表這個名詞雖然經常出現在史料當中、卻不具備意識形態的可能性，之後更提出無法成型的原因是這座城市的論述發建構是宗教意涵大於政治意涵的 (Halperin, 1999: 361–363)，而這也許是因為諾夫哥羅德的歷史所致，在這座共和國的體系當中早已沒有基輔大公能夠左右的位置。Halperin 重新討論了十九世紀經過歷史主義洗禮的諾夫哥羅德歷史建構，指出十九世紀風行的意識形態之說有其盲點，並將這段中世紀的歷史重新以歷史主義的方法來詮釋。

Filyushkin 透過「中世紀精神」來重新閱讀普斯科夫的歷史建構，並指出在十九世紀時，對於普斯科夫的歷史論述建構經歷了偌大的轉變。在十九世紀前半同樣地也有大批關於普斯科夫這座城市的史料重見天日，而當時的研究者根據史料來重新建構這座城市的歷史，政府並在當地豎立了相關的雕塑來重現史料中的戰爭場所；此外，普斯科夫的歷史論述重新詮釋不只被納入「俄羅斯史」的論述當中、助長了民族意識的發展，帝國也同時將俄羅斯的歷史論述作為教材來宣傳（斯拉夫民族）一體的政治理念 (Filyushkin, 2018: 572)。

Filyushkin 針對歷史論述做出了詳盡的解釋。當時的研究者整理了四處收集而來、最後一併落腳同一收藏處的歷史文獻，並先後編成有系統性的出版品，其中包括 1831 年由普斯科夫主教 Eugene Bolkhovitinov 收集編成的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ity of Pskov* 以及 1835 年由土地測量員 Ivanov 出版的 *The Views of Pskov and its Environs Drawn from Nature* 第一卷 (Filyushkin, 2018: 573)，這些出版可以視為科學學科專業化帶來的影響。此外，這些史料也可以結合軼聞產生新的傳說，十九世紀中期由民族誌暨民謠收集專家 Pavel Yakushkin 記載的基輔的奧爾加故事則是一例 (Filyushkin, 2018: 575)，同時間劇作家 Lev Mei 也完成了 *The Maid of Pskov*。Filyushkin 表示在十九世紀前半，普斯科夫的歷史建構正經歷一場

重新形塑十六世紀普斯科夫歷史記憶的運動，而這個運動也多少促成了 1879 年普斯科夫考古學會的創建，這個學會的創立目的也延續了之前的歷史考究與實踐文物保存的必要 (Filyushkin, 2018: 577)。Filyushkin 深入的描寫不只體現了普斯科夫在十九世紀的歷史建構中的科學學科專業化及 (文學的) 歷史主義元素，也點出了其在十九世紀後半帶來的後續影響。

Bilenky 針對十九世紀基輔歷史論述的研究也大致符合科學學科專業化與文學的歷史主義涵蓋的內容，跟普斯科夫的歷史建構一樣都是透過中世紀精神的角度切入研究。Bilenky 指出從 1820 年代開始就有學界人士，其中包括上述提及的 Eugene Bolkhovitinov，跟業餘人士在基輔城市及周遭進行考古挖掘，並有了一定的成果，這些在十九世紀前半挖掘出來的遺跡帶來的影響莫過於加強了基輔作為一座古城的歷史想像 (Bilenky, 2011–2014: 116–117)。根據十九世紀的植物學教授與烏克蘭史學者 Mykhailo Maksymovych 所言，在歷經了幾百年的風霜之後，十九世紀前半的基輔已經翻新了許多，至於那些中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的歷史建築物已經不復存在或是埋沒在荒煙蔓草之中，城市裡面當時僅有聖索菲亞大教堂與聖米迦勒金頂修道院留存下來 (Bilenky, 2011–2014: 114–115)。

如果基輔在當時已經是一座翻新的城市，中世紀精神又要如何影響其歷史論述呢？Bilenky 指出當時一眾知識份子都是採用過度理想的態度去面對基輔的歷史建構，並且透過分析十九世紀前半知識份子的發表作為佐證。一般而言，除了自認烏克蘭 (小俄羅斯) 出身的知識份子會由哥薩克歷史著手之外，例如烏克蘭作家 Panteleimon Kulish 在 1840 年代出版的歷史小說《黑色會議》，波蘭與俄羅斯的知識份子都認同將基輔與宗教聯結，只是波蘭知識份子強調基輔作為斯拉夫民族接受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性，而俄羅斯知識份子則是強調東正教的重要性，他們並更而將基輔的重要性作為一種史實來與自己的民族詩歌聯結、衍伸出文學的歷史主義在俄羅斯帝國的脈絡。

波蘭詩人 Tymon Zaborowski 在 1818 年發表了” The Taking of Kyiv” 來表達波蘭與烏克蘭在 1018 年的歷史糾葛 (Bilenky,

2011–2014：109)。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先是將基輔羅斯納入俄羅斯文學創作、接著置於歷史的脈絡之中，牽起了由基輔羅斯一路發展到尼古拉一世的線性史觀，這些創作從 1820 年代開始一路延續，並在 1830 年及 1863 年兩次波蘭人起義之後都加強了這種論述，其中包括了斯拉夫派 Aleksey Khomyakov 在 1839 年發表的”基輔”與浪漫詩人 Vladimir Benediktov 在 1840 年發表的”基輔”，除了美化基輔羅斯的歷史意涵以及對於當代俄羅斯帝國的意義之外，Khomyakov 在詩作中更抨擊了波蘭人在中世紀對於基輔的蹂躪 (Bilenky, 2011–2014：110–111)。俄羅斯知識份子的作法或許現在看起來有點不適合；然而，作為呼應尼古拉一世與大臣 Uvarov 在 1830 年代中期提出的官方民族理論，這些關於基輔歷史的詩篇也就不足為奇，畢竟基輔大學就是在 1830 年代中期由尼古拉一世拍板落成、作為研究基輔羅斯的學術重鎮，創建時並以聖弗拉基米爾為名，更遑論尼古拉一世自稱是弗拉基米爾大公的承繼者 (Bilenky, 頁 118)。

Maksymovych 雖然也支持烏克蘭知識份子聚焦的基輔與哥薩克歷史的關聯；然而，在當時的氛圍下，仍然採用折衷的論述方式，一面不反對哥薩克與基輔的歷史論述，另一方面則也追隨尼古拉一世的想法，除了強調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基輔、伊凡三世的莫斯科與彼得大帝的聖彼得堡線性史觀之外，也將基輔視為「俄羅斯的靈魂」(the Russian spirit)，象徵著東正教的精神、基輔羅斯研究重鎮與對抗波蘭天主教思想的據點 (Bilenky, 2011–2014：120)。

## 5. 小結

總結來看，十九世紀前半的俄羅斯城市歷史論述除了遵循科學學科專業化與文學的歷史主義交會出來的軌跡之外，在後續的發展上都是朝著將城市的歷史論述建構與俄羅斯線性史觀融合的方向前進，這個方向加強了俄羅斯帝國在民族意識的歷史建構上的正當性；雖然如此，科學性的知識依然在發展，同時也在城市中創立了地方性的研究型機構。筆者認為，在探索意識形態帶來的主觀思辨時，也需要重新回歸文獻資料查看當時的客觀背景，以免過度陷於主觀意識架構出來的討論空間。

## 參考書目

- Antipov, I. & Gervais, A. “The Bricks from St. Nicholas Church at Lipno near Novgorod (1292)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Novgorodian Building Tradition.” *Estoni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15. Vol. 19. No. 1. Pp. 58–79.
- Bilenky, S. “Inventing an Ancient City: How Literature, Ideology, and Archeology Refashioned Kyiv during the 1830s and 1840s.”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011–2014. vol. 32/33. Part 1. Pp. 107–126.
- Farber, Paul.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982. Vol. 15. No. 1. Pp. 145–152.
- Filyushkin, Alexander. “‘To Remember Pskov’: How the Medieval Republic was Stamped on the National Memory.”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2018. Vol. 66. No. 4. Pp. 559–587.
- Halperin, Charles J. “Novgorod and the ‘Novgorodian Land’.” *Cahiers du monde russe*. 1999. Vol. 40. No. 3. Pp. 345–364.
- Leerssen, Joep. “Literary Historicism: Romanticism, Philologist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04. Vol. 65. No. 2. Pp. 221–243.
- Petronis, Vytautas. “Mapping Lithuanians: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Imperial Ethnic Cartography, 1840s—1870s.” *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2011. Vol. 63. No. 1. Pp. 62–75.
- Salmina, Elena. “Fishing Settlements in the Pskov Region in the 16th Century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Written Sources).”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16. Vol. 21. No. 4. Pp. 402–410.
- Zinoviev, A.V. “Study of the Medieval Dogs from Novgorod, Russia (X—XIV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2. Vol. 22. Pp. 145–157.
- Герцен, А.И. “Былое и Думы: Часть 4 (Москва, Петербург, и Новгород) 1840-1847.” Lib.ru, 21 Nov. 2022.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URL: [http://az.lib.ru/g/gercen\\_a\\_i/text\\_0130.shtml](http://az.lib.ru/g/gercen_a_i/text_0130.shtml).
- Павлова, Г.Е.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 米羅諾夫著，張廣翔譯。《俄國社會史(下卷)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治國家的形成》。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 保羅·勞倫斯·法伯著，劉星譯。《發現鳥類：鳥類學的誕生（1760–1850）》。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 蒂莫西·斯奈德著，潘夢琦譯。《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